

古文选粹对译丛书

明代传记选粹

李枝枢 译注



古文选粹对译丛书

明代传记选粹

李枝枢 译注

天津教育出版社

明代传记选粹

李枝都 译注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鞍山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 6.125印张 1插页 13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09-0174-5

I·23 定价: 1.50元

序

卞孝萱

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叫做“传记”，或单称“传”。说起我国的传记，可谓种类多、数量大、成就高，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 史 传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的某些篇章，已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许多人物形象。但这些篇章还不能称之为传记。因为：《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是以事为纲——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叙述，而不以人物为描写中心。书中的人物，是随着历史事件出现的，一个人的生平，往往被分割在若干篇章之中。

西汉中叶，司马迁撰《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史学。他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成功地描写了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列传又分为几种：一人一传为“专传”（如《孟尝君列传》），数人一传为“合传”（如《孟子荀卿列传》），品质或行事相似的若干人一传为

“类传”（如《儒林列传》）等。

从《汉书》起，所谓“正史”，都承袭了《史记》的体裁，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史记》有《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汉书》中降为《陈胜项籍传》；《新唐书》把农民军领袖黄巢写入《逆臣列传》；《明史》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写入《流贼列传》，可见封建“正统”观念在正史中日益加强了。《史记》、《汉书》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以后的正史中不再看到，而《孝义列传》（《孝行列传》、《孝友列传》）出现，说明正史中日益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了。《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之外，增添《文苑列传》，为以后的正史所效法；《宋史》又增《道学列传》，《清史稿》又增《畴人列传》，这是各封建王朝文化成果在正史中的反映。从《后汉书》起，正史中多有《宦者列传》；《新唐书》又置《藩镇列传》、《奸臣列传》、《叛臣列传》，《新五代史》则设《义儿传》、《伶官传》，《明史》在《宦官列传》之外，又有《阉党列传》，这是正史为了总结各封建王朝兴亡成败的教训而作。我们要分清正史各种传记中的精华与糟粕。

纪传体的史书，除正史外，还有大量的“别史”。别史的写作情况，大致如下：一种是写在同类的正史之前，为正史的编撰，提供了条件。如：在《后汉书》、《晋书》之前，已有多种有关东汉、两晋的别史，“成书既多，来择自易”。《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东观汉记》就是作为《后汉书》蓝本的别史

之一，由于正史流传，别史大多散佚，但其草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一种是写在同类的正史之后，为补充正史的不足而作。如：谢启昆认为《魏书》以东魏为正，西魏为伪，道理上讲不通，史实亦多疏漏，遂撰《西魏书》。吴任臣认为《新五代史》所载十国史事，很不完备，乃撰《十国春秋》。

纪传体的正史、别史中的传记，可以合称为“史传”。

中唐以前，史传在我国传记文学中有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史记》。它既是历史名著，又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司马迁所写的人物传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被称为“不虚美，不隐恶”。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是极高的。

司马迁用散文写传记，树立了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即使在东晋、南朝骈文盛行时期，也不能排摈散文于史书之外。东晋、南朝人所撰史传，叙述用散文，论赞用骈文。姚察、姚思廉父子所写的《梁书》、《陈书》中的传记，论赞也用散文。这个成绩，应该肯定。

封建王朝对史书编纂工作的控制越来越严，帝王权臣监修正史，束缚了修史者的才能，限制了史传的思想、艺术水平。加以文学与史学由合而分，史传侧重于历史人物事迹的考订、功过的评价，而相对地忽视了文采。所以，不是史传

都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的。

二 杂 传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如《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书中，也有涉及人物事迹的某些片断。但这些片断也还不能称之为传记。因为：《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书是说理之书，不是记人之书。书中某些人物的出现，是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举的例子，并非从头到尾地描写一个人的一生，不能独立成篇。

司马迁开创了写传记的风气，经历两汉魏晋南北朝，传记文学迅速发展，在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都丰富多样。

一种是以类相从的传记总集：西汉末叶，在《史记》类传的影响下，刘向编撰《列女传》，这是在纪传体的正史、别史之外，专门记载某一类历史人物的事迹，汇合为一部书——传记总集。此后，作者增多，名目亦广。推究其结集的标准，或以“志尚”（如《海内先贤传》），或以朝代（如《吴先贤传》），或以邑里（如《陈留耆旧传》），或以家世（如《太原王氏家传》），皆“不在正史”。所谓“家传”，即与“国史”相对而言。

一种是自传：司马迁曾撰《太史公自序》，放在《史记》末篇。虽然此文主要是自述创作意图和经过，但也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班固撰《叙传》，上篇叙述家世；下篇介绍《汉书》纲要，放在《汉书》末尾。后来王充撰《论

衡·自纪篇》，不仅记叙自己的简历，更着重于表述自己的志尚。王充的《自纪》，受司马迁《自序》的启发而有所发展，可以看做一篇自传。古代的自传，多偏重于述志、抒情，对自己的经历，不宜夸耀，与“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碑、表、碣、志，有明显的区别。（五代时，冯道作《长乐老自叙》，夸耀官职“以为荣”，被批评为“无廉耻”。）

一种是单篇的“别传”：别传，是对“本传”（家传、史传）而言。或因无本传而作，或为对本传之补充。撰写别传的风气，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魏晋时大盛。从对象来看，文臣、武将、文士、艺人无所不有，至为广泛。

还有几种文体，也带有传记性质。

神道碑：树立在墓道上，刻着死者事迹的石碑，叫做“神道碑”。起于汉代，用于上层人物。

墓表、墓碑、墓碣：树立在墓前，记载死者事迹的石刻，叫做“墓表”。方顶的叫“墓碑”，圆顶的叫“墓碣”。与神道碑“异名同物”。

墓志：放在墓中，记载着死者事迹的石刻，叫做“墓志”。东汉时立碑极滥，魏武帝曹操下令禁止，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废禁，此后墓志代碑文而兴起。

好象史传有论赞，神道碑、墓表、墓碑、墓碣、墓志多有“铭”。

行状、行述：记叙死者事迹的第一手的文章，叫做“行状”，简称“状”，亦称“行述”。供撰写碑、表、碣、志及史传者采择；也可由死者家属上呈封建王朝，供议谥时参

考。

行状、行述也可刻在碑上，称为“墓状”，立在墓前。

谀：记叙死者事迹，并表示哀悼的文章，叫做“谀”。起初多用于上对下，其后也不尽如此。东汉时，傅毅、崔瑗撰谀，“序事如传”，可见这时谀已具备传记性质，所以《文心雕龙》有《谀碑篇》，将谀与碑并称。一般地说，谀比碑更重于抒情。

哀辞：对死者表示哀悼的文章，叫做“哀辞”。起初多用于童殇夭折，其后也不尽如此。《文章流别论》说哀辞是“谀之流”。对死者表示哀悼并记叙死者事迹的哀辞，与谀一样，也具备传记的性质。

谀与哀辞也可刻在碑或志上，立在墓前或放在墓中。

以上所介绍的史传之外的各种形式的传记，可以合称为“杂传”。

三、史传与杂传的比较

史传与杂传，虽都是记人之作，但写法有所不同。因为：史传是正史或别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避免与其他部分（如：纪、志、表）重复，往往采取“互见”之法；杂传则专写传主一人。史传着眼于褒贬，经常板着面孔讲话；杂传比较自由一些。魏晋时期的别传，尤能通过遗闻轶事的刻画，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娓娓而谈，栩栩如生。

杂传与史传，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拿《后汉书》来说：西汉刘向、晋皇甫谧等，都编撰过

《列女传》（传记总集），后来范曄在《后汉书》中也立了《列女传》；现存资料还可证明，《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董祀妻传》，有因袭《蔡琰别传》之处。又，在范曄之前，已有过几种《逸士传》（《逸民传》）、《孝子传》（《孝德传》、《孝友传》）、《文士传》，《后汉书》中立逸民、孝友、文苑三传，都是学习前人，而不是首创，再拿《清史稿》来说，也是效法阮元《畴人传》而立《畴人列传》的。至于正史中的专传，取材于碑、表、碣、志、家传、行状，更是普遍现象了。杂传导源于史传，却起了反哺的作用。

史传、杂传各有局限性。史传忌讳太多。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写的刘邦，是一个神圣人物，只能在《项羽本纪》中写刘邦的流氓无赖行径，《留侯世家》中写刘邦的好色贪财，《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淮阴王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谴责刘邦杀戮功臣的残酷无情等。在正史中最有进步意义的《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各史，更不必说了。碑、表、碣、志、家传、行状多出于死者的门生故吏或亲属之手，往往夸张甚至编造一些事实，对死者进行歌颂。连东汉最著名的碑文作家蔡邕，也有不少谀辞。极少见到碑、表、碣、志、家传、行状中评论死者的过错。

《经史百家杂钞》传志类上编“以马、班、陈、范为宗”，下编“以蔡、韩、欧、王为宗”。司马迁、班固、范曄、陈寿是“前四史”的作者，蔡邕、韩愈、欧阳修、王安

石是撰写碑、志、传、状的名家。可见中唐以前，史传的成就大；中唐以后，杂传造诣高。

韩愈、柳宗元成功地领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其中包括了传记文学的革新。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的例子：（一）柳宗元把传记的写作对象，从达官、贵人、名流、高士转向不知名的小人物，这是《史记》之后的人物传记的新发展。柳宗元对下层人物有深切的了解，真挚的感情，把一技之巧，一得之见，都写入传记。或借题发挥，寄寓自己的进步思想；或反映人民疾苦，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都具有战斗意义。（二）韩愈所写的碑、志，打破了六朝以来呆板的、公式化的规格，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写得有血有肉，维妙维肖。他在《王君墓志铭》中，叙述王适骗娶妻子的经过，情节滑稽，带有传奇性。这种大胆的写法，似乎有损墓志的严肃，但“天下奇男子”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各种文艺样式是有联系的。古文运动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传记文学以借鉴。韩、柳之外，如李翱《韩公行状》写韩愈宣抚王廷凑事，沈亚之《李绅传》写李绅拒绝为李锜起草奏疏事，李商隐《李贺小传》写李贺被天帝召为书记事，杜牧《张保皋郑年传》写张保皋与郑年、郭子仪与李光弼释忿平乱事，都带有传奇色彩，增加了文章的艺术魅力，而不违背历史的真实，这是唐代传记文学的一个特点，对后代作者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宋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中，虽然也有优秀的传

记，但其影响绝不能与“前四史”相比，而他所撰的碑、表、碣、志，却是宋、元、明、清许多散文家心摹手追的范本。这也是中唐以后传记文学的重心由史传转移到杂传之一证。

附带说明一个问题。托名汉人所撰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西京杂记》、《飞燕外传》等，杂载琐事，“闲漫无归”，“杳昧而难凭”。魏晋以来，生产不少专记士大夫轶闻隽语的笔记，《世说新语》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笔记描写人物，多带故事性，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至于阮籍《大人先生传》、陶潜《五柳先生传》等，“咸以寓言为本”。以上三类，都不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此外，考订性的“年谱”，以“幻设”为主要特征的唐、宋传奇，纯粹“谀墓”的碑、表、碣、志等，也不能算是传记文学。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真实、完整、鲜明、生动，可以作为鉴别传记文学的标准。怎样运用这一标准，把传记文学与历史著作、笔记小说区别开来，还要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多种多样的古代传记，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事迹，此外，还描写了许多高尚、智慧、勤劳、勇敢的可歌可泣的小人物形象。二千年来，一切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显示了中华民族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民族精

神，这种精神，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并加以发扬光大。读了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从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榜样，汲取经验，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古代的许多传记作家还是唯心史观，这是必须分清的。

天津古籍出版社为了向广大青少年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提高他们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的能力，正在编辑一套《古文选粹对译丛书》。其中有唐、宋、明、清传记选粹四册。中唐以后，传记文学的重心，不在史传而在杂传，从唐、宋、明、清的碑、志、传、状中选粹，方向是对头的。

从这四册的选文来看，颇具特色：（一）选文小而精。长而好的名篇，节选其中最精采的部分。（二）选文的思想比较健康，感情比较浓厚，语言比较浅显，又有文采，引人入胜。每篇选文，都有作者简介、题解、注释、简明扼要。对于选文，还划分段落，点出段意。译文通顺流畅，可读易懂。

这套丛书的出版，为青少年读者进行学习，继续深造，继承祖国优秀文学遗产，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十分赞成，乐为之序。

明代传记文学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记文学，自东汉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不朽的《史记》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后，又相继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使中华民族众多人物，在历史长廊里得以展示，中华民族精神，能够被记录下来，发扬千秋。

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干扰，文学与史学的“分流”，及其传记者思想艺术水平的制约等缘由，一些“正史”中的“史传”，其思想性、艺术性却是每况愈下；相反，一些散见于各家各派的文集中的人物传记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繁衍起来，虽然没有多少象“前四史”中展示的那么众多彪炳史册的形象，但在当代，也发展到足以与“史传文学”分庭抗礼的地步；又兼以这些人物传记文章，多出自一些散文名家的手笔，其风格因人而异，艺术上各有千秋，终使同时期的“史传文学”相形见绌。唐、宋八大家在这方面都有些力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占主流的明朝，诗文比起以往各个时期处于一种衰退的状况，但传记文学却在明代文坛

的各种流派的争斗中，艰难地发展下来，且不乏别具特色的优秀作品，这也许是传记文学得利于小说、戏曲这些参天大树根须的接触的缘故吧。

明初的一些文人，由于经过了元末的大动乱，因此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较有成就的当数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人。

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尽管写过一些开国功臣的神道碑、充满封建陈腐气味的贞节烈女传，但就其大部分传记文来说，还是较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成为他的散文作品的主流。象《秦士录》、《王冕传》、《杜环小传》等，都是传记文学史上的名篇。其传记文在艺术上更是别具特色，善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塑造人物；或抓住一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突出人物的性格；或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渲染突出人物形象；或运用鲜明的对比，揭示人物的品德、精神风貌等。他以自己的传记文作品，为明代传记文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作为开国功臣之一、诗文兼长的刘基，善于用寓言形式表现他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巧妙地折射社会现实。但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传记文章，少有典型之作，故本集没有选录。

作为明代成就最高诗人之一的高启，同样以其豪放不羁的诗笔，塑造了不少性格鲜明的形象。《书博鸡者事》最有代表性。他通过这位敢于惩治豪强、为老百姓大张正义的“博鸡者”的所作所为，揭露了元末社会的黑暗，表达了自

已的爱憎。其笔法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生活在明太祖以后权势之争的动荡年月里的方孝孺，其笔下的人物就有些“怪异”，《溪渔子传》中的“溪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借此作者寄寓了自己的生活和情怀。《吴士》直接反映了作者的社会观，又不失为一篇绝妙的讽刺传记小品。这些都让我们领略了方孝孺的豪放的文风。

明中叶以后，文坛上发生了拟古主义和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爱国主义作家等。

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在其传记文中多有体现，且少有感人之作，故无法选录；相反，反复古主义的各派，在其传记文中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各自的创作倾向，且多有典型之作。

首先以其平易清新的文风，多才多艺的创作实践与声势煊赫的“前七子”相颉颃的，要属“吴中四才子”了。祝允明为其挚友唐寅写的墓志铭，不仅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而且使才华出众，狂放脱俗的唐寅的形象，永恒地留在读者心目中。

反对拟古主义最著名、自觉提倡唐、宋古文的“唐宋派”代表归有光，尽管他的大部分古文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但是他能把生活琐事引到“载道”的古文中来，写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也真是难能可贵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这些优秀的传记文，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典型

细节，寥寥几笔，就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自然、真挚的感情充满字里行间，这怎么能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呢！

反对拟古主义最有力、对晚明文学影响较大的李贽，是一个思想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的散文，能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陈亮传》即为陈亮作传，也是为自己写“行状”，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赞刘谐》是作为他的论说文中为证明某一论点而举的例子出现的，人物也许是虚构的，这种发轫于先秦时代的史书以外的、又能独立成篇的人物传记小品，为什么不能以真正的传记文学目之呢？何况又是李贽泼辣犀利文风的集中体现，《韩非子》遗风的承续！

受李贽影响最深、大张“反复古”旗帜的“公安派”，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他们的创作主要成就是散文，尽管题材狭窄、思想贫乏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但他们能以清新活泼的文字，解放了的文体、打破复古派在文坛上死气沉沉的统治，怎能埋没他们对明代传记文发展的贡献？读一读《徐文长传》和《李温陵传》，答案就十分清楚了。

在“公安派”势力大张的时候，文坛上出现了另一个异军突起的流派，即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究其大部分作品来说，流于冷僻苦涩，文气显得不畅，不想《白云先生传》却一改其冷涩的风格，给人以流畅简洁之感。

为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冯梦龙，在编辑话本、改写小说戏曲的间隙，编著的《智囊》等集，选有不少名人轶事，大大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仅选《刘大夏》